

明中晚期江西宗室與士人社集

張藝曦

目前學界對明中期文學復古運動的焦點多放在江南一帶，而較少關注同時期江西復古派的活動，以致於也很少人談到江西宗室在其中的角色，所以本文從社集活動的角度切入，談江西宗室與士人的關係，以及部份宗室的轉變，我們既看到宗室與士人共同主持詩社，也有宗室以博學或經史著稱，當士人轉向制藝寫作，宗室仍持續發展詩社，直到明末始衰。此亦有利於我們了解何以明清之際不時可見宗室的身影。

文學復古運動與社集

十六、十七世紀，即中國明代中晚期及明清之際，各地出現許多以士人為主的大大小小社集，在此之前雖然也有一些社集的記錄，但在數量上都沒有這段時期多。同時期興起三股風潮，分別是明中期的文學復古與心學運動，以及明末的制藝風潮，而分別帶起詩文社集（尤其是詩社）、心學講會、制

藝文社的流行。本文主要討論與文學復古運動、制藝風潮相關的宗室活動。

文學復古運動起於十五世紀末、十六世紀初，而在嘉靖（1522-1566）、隆慶（1567-1572）、萬曆（1573-1620）三朝達到高峰，該運動的特色之一即擴展參與成員。如吉川幸次郎指出，隨著文學復古運動的盛行，民間詩壇日益活躍，作詩的已不僅限於士大夫，



圖1 | 明 明人畫幅集冊 冊 明朱承綵梨花白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 | 王世貞《會州四部稿》卷66 芙蓉社吟稿序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還有許多的中下層士人及布衣處士的加入，這也讓明中期以後的詩作數量達到高峰，¹而各地都有詩文雅集，尤其以詩社為大宗，這些詩文雅集雖未必都直接跟文學復古運動有關，但仍可視為是此大風潮下的產物。

不過，過去討論文學復古運動較多著眼在往下擴展成員，而較少注意到同時也往上擴展到地方上的宗室王府。明代藩王宗室向來是較不受注意的一群，直到近年才陸續有一些研究，其中最受矚目的當推 Craig Clunas 的 *Screen of Kings: Royal Art and Power in Ming China*，該書選擇山西與湖廣兩地的藩王，藉由檢視他們的文化品味與取向，討論作為大朝廷（great court）的一部份的藩王與文人士大夫、與地方社會之間的交集互動。但迄今為止，仍較少人注意到宗室與社集的關係。

一些宗室常在詩社中有重要角色，如萬曆年間齊王孫朱承綵主持的金陵大社，便吸引許多知名士人前來與會，錢謙益（1582-1664）的《列朝詩集小傳》載：

萬曆甲辰（1604）中秋，開大社於金陵，胥會海內名士，張幼于輩分賦授簡百二十人，秦淮妓女馬湘蘭以下四十餘人，咸相為緝文墨、理弦歌，修容拂拭，以須宴集，若舉子之望走鎖院焉。²

張幼于即張獻翼（1534-1604），是當時江南一帶十分知名的士人，而該社既有妓女多人，可知主要以宴遊玩樂為主。大社以外，朱承綵也主持其他社集，如南京迴光寺的小山社，同樣有妓女陪侍在側，亦屬於宴遊性質。³（圖1）朱承綵並非孤例，如河南周藩宗正朱睦㮮，既以藏書著稱，亦曾主持詩社。⁴不過，更具代表性的，應推江西寧王府宗室及其所倡立的芙蓉社。（圖2）

江西宗室與芙蓉社

目前學界對明中期文學復古運動的焦點多放在江南一帶，而較少關注同時期江西復古派的活動，以致於也很少人談到江西宗室在其中的角色。明代江西藩王主要有三系，分別是南昌的寧藩王系、鄱陽的淮藩王系，以及南城的益藩王系。由於寧藩王系宗室較多參與社集活動，所以本文只談此系。寧藩王系有弋陽王府、建安王府、樂安王府、臨川王府、宜春王府、鍾陵王府、瑞昌王府、以及石城王府，都在南昌府境內。宗室因不能參加科舉考試，亦少有機會進入中央朝廷任官，所以部份宗室用心於詩歌吟詠，而在全國眾多王府中，寧王府宗室在詩作的成就頗為人所稱道，甚至有「國朝宗藩之詩，寧府為盛」⁵之類的贊語，其中以朱多燿（1534-1596）、

朱多炆（1541-?）、朱多燝（1530-1591）三人的聲名最著，尤其朱多燝名列續五子之一，三人的詩作也因復古派主盟王世貞（1526-1590）的推薦，流傳於江南士人群體間。

朱多燝與南昌士人領袖余曰德（1514-1583）共同成立芙蓉社，是當時江西詩壇的大事，社集的地點芙蓉園在朱多燝的王府內。芙蓉社的成員不少，較著名的士人有喻均（1539-1605）、楊汝允（1562年進士）、況叔祺（1550年進士）、方來崇（1556年進士）、胡汝煥，都是明中期江西詩壇十分活躍的人物。宗室方面則以多字輩的朱多燝（圖3）、朱多燝（圖4）、朱多炆、朱多炤（1546-1619），以及謀字輩的朱謀境（1530-1607）、朱謀境（1537-1619）幾人為核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王世貞常以五子或七子來稱呼同道，而朱多燝、朱多炆，以及下一輩的朱謀境、朱謀境等宗室，常與方來崇、趙來亨、彭翼等人合稱五子或七子，⁶似有仿後七子、續五子等稱號之意。

明制，宗室不能擅離封地，所以難以外出訪友，較常見的是外地士人前來拜訪，如廣東歐大任（1516-1596），字楨伯，歲貢生，他是廣東的南園後五子之一，而在復古派列名廣五子中，他便曾往南昌拜訪朱多燝，並作客朱多燝的弋陽王府中。閩中十子之首的曹學佺（1574-1646），以及江南錢希言（1562-1638）亦曾過訪，錢希言的《二蕭編》就是此次江西行的記錄，內容泰半是與宗室往來酬贈的詩作。另一方面，不少宗室會通過書信與江南士人贈詩唱和，如張鳳翼（1527-1613）在寫給胡汝煥的信中問候芙蓉社的宗室成員，說：「諸賢王孫不能一一通候，然神馳軫翼下，蓋夢見之矣。」⁷可見雙方也有信件往來。

宗室須受制度規範，而朱多炆的個案則很值得一提。朱多炆曾多次改換姓名為來相如前往江南地區，當地士人有時會幫忙隱晦身份，但有時則直言不諱，指朱多炆「私去



圖3 | 明 明人畫幅集冊 冊 明朱多燝 松崦閒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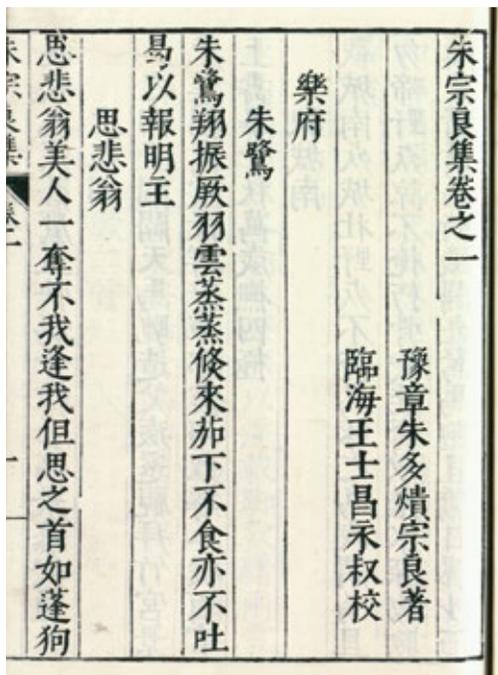


圖4 明 朱多燿著 《朱宗良集》卷1 明萬曆丁酉（25年）
原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豫章遊金陵」，⁸所以在這些士人的著作中不時可見到他的身影。朱孟震（1568年進士）的一段文字最足以說明朱多燿四方遊歷，與各地士人往來的情形：

友人朱貞吉氏，寧憲王裔孫也，任俠而好遊，又攻為詩，……蓋燿於癸未（1583）歲某月入玉筍，歷閩邑、青原，迄於宜春之臺，感慨賦《薄遊》，則張羽王為之序。八月濟揚子往來金、焦，望海上積氣，吊李供奉采石，則吳明卿為之序《遠遊》。甲申（1584），自黃白岳，登會稽，探禹穴，泛震澤，棲虎丘，則王元美為之序《澹遊》。丙戌（1586）渡鄱陽，歷武夷，息匡阜，則李本寧為之序《美遊》。⁹

《薄遊》、《遠遊》、《澹遊》、《美遊》是朱多燿的四本詩集名，而分別得到張鳴鳳、吳國倫

（1524-1593）、王世貞、李維楨（1547-1626）四位名家作序，可見其人其詩頗為時人所重。朱多燿之子朱謀埏亦效其父變姓名為來鯤，字子魚，前往江南遊歷。（圖5）

士人、宗室分流與明末宗室的士人化

士人與宗室共同主持詩社的情形在萬曆中期以後有變，這從社集成員的組成變化可見一二。明代江西最具代表性的兩個詩社，前有芙蓉社，後有萬曆中期的匡山社。芙蓉社由余曰德與朱多燿共同主持，匡山社則清一色是年輕一輩的士人組成。匡山社沒有宗室並非偶然，我們可以參考舒曰敬（1558-1636）的《皇明豫章詩選》，這本詩選選錄匡山社士人及芙蓉社士人如余曰德的詩作，但朱多燿等人的詩作全未入列。將此詩選放在江西詩壇發展史來看，便可發現宗室明顯被邊緣化了。

宗室被邊緣化的原因有二，一是詩風。萬曆中期以後，整個詩壇風氣已從復古派轉向公安派，匡山社的這批年輕士人正有意與公安三袁——即袁宗道（1560-1600）、袁宏道（1568-1610）、袁中道（1575-1630）一爭雄長，明末陳弘緒（1597-1665）總述江西詩壇發展，便指出從芙蓉社到匡山社的變化，他說：

豫章之詩，當王、李時，芙蓉社稱盛；已再盛於匡山社，則公安諸袁爭雄長焉。¹⁰

所謂一爭雄長，既意味其詩作已非復古派流風，而且有可能還受到公安派的影響。當詩壇已有此變動時，江西宗室卻多仍停留在朱多燿以來的復古派詩風，這也讓宗室與這些年輕士人之間難有交集。

第二，也是更重要的，則跟明末制藝風潮興起有關。由於士人日益投注心力在制藝寫作上，加上許多制藝文社興起，所以明末

江西雖仍有詩社，但詩社成員跟制藝文社的成員幾乎重疊。在制藝風潮下，制藝為主，而詩作只成附屬，亦即制藝才是主旋律，詩作只成了小調。陳弘緒與傅占衡（1606-1660）二人的話正可說明，陳弘緒說：

八股學問，聰明之會也，三百年人主玉帛在是，即人才川嶽亦在是，故辛亥（按：萬曆39年，1611）以來，八股未窺而能詩古文者，鮮矣。

傅占衡則說：

賦比興風雅頌，此詩人六義，特時文中一體耳，古文亦然，奈何薄八股。¹¹

陳弘緒，字士業，南昌人，傅占衡，字平叔，臨川人，二人分別是明末南昌、臨川一帶的年輕士人領袖，而兩地也是明末江西制藝文社最發達的地區，所以二人的評論頗具代表性。陳弘緒說人才須從制藝中出，而未窺制藝者則不能精擅詩古文辭。傅占衡則把詩的六義——賦比興風雅頌，說成只是制藝的一體而已。此正可印證制藝是主旋律，詩作只是小調的判斷。

當士人勤於制藝，而宗室因不能赴科考所以仍用心於詩作，有才學者甚至另及於經史著作的考訂。此時芙蓉社已不再舉行，朱多燧等人或卒或病，朱謀埠（字鬱儀，1551-1624）才是這一代的宗室領袖，朱鬱儀不僅

管理石城王府事，而且詩文學問亦為眾人所推服，如陳弘緒說：

埠為詩取法盛唐，諸王子侯罔不退舍相避，而埠獨不屑以詩名，矻矻經史。¹²

朱鬱儀的博學多聞自不待多言，他所考訂的書籍及著作達百餘種之多，足以與楊慎（1488-1559）、焦竑（1540-1620）等博學之士並列。而朱鬱儀的詩名雖稍遜於其博學，但當時仍有一百四十多位知名士人與朱鬱儀共結長松社，跟曹學佺在南京主持的金陵社桴鼓相應。長松社與金陵社都是詩社。萬曆四十三年（1615）舉行的龍光社便以朱鬱儀等宗室為主角，據載：

南昌郭外有龍光寺，萬曆乙卯（1615）二月豫章詩人結社于斯。宗子與者十人，知白（按：朱多燧，1549-1629）之外，則宜春王孫謀劉文翰，瑞昌王孫謀雅彥叔（1530-1607），石城王孫謀鬱儀，謀圭禹錫（1553-1642），謀璠誠父（1550-1629），謀塚藩甫（1558-1620），謀壘辟疆（1564-1619），建安王孫謀穀更生，謀聖禹卿（1584-?），謀劉緝其詩曰《龍光社草》。郡人都察院右都御史掌工部尚書事徐作汝念（1562年進士）、邢部主事張壽朋冲蘇（1583年進士）序之。¹³

龍光社似持續數年，規模應不小，《千頃堂書



圖5-1 明 朱多燧 荷花野鳥圖 扇頁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取自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，《中國繪畫全集·15·明6》，北京：人民美術出版社，1988，頁129。



圖5-2 明 朱多燧 為文橋作山水 扇頁 無錫市博物館藏
取自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，《中國繪畫全集·15·明6》，頁129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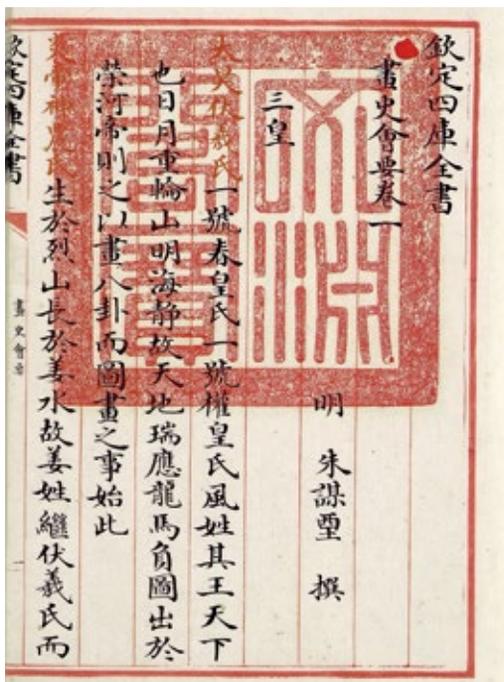


圖6 明 朱謀聖 《畫史會要》卷1 清乾隆間寫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目》指稱「同社者凡四十三人」，¹⁴可知除了宗室以外，另有三十三名士人與會。

但陳弘緒卻尖銳批評此時的宗室詩社，他說：

當是時，諸王子侯科目未開，不得與有司之試，亦尚未行所謂換授法，率得肆力于學，然大槩資以為詩，詩亦率求工五七言近體而略古體樂府，益無研究於古文詞者，至經史之學尤格格弗置于胸臆。¹⁵

陳弘緒指宗室因不能應科考而將心思放在詩作，而且選擇近體、忽略古體樂府與古文辭，正是暗指宗室不好讀書、不講究學問，而僅好吟風弄月、附庸風雅而已。此亦可見當時的年輕士人對宗室結詩社事已多抱持負面觀感。

天啟（1621-1627）、崇禎（1628-1644）年間宗室在南昌東湖舉行詩社所引起的紛擾，

亦可佐證陳弘緒的批評並非無的放矢，據彭孫貽（1615-1673）說：

豫章王孫多工詩，……游伎研仙至豫章，能詩工筆札。王孫紳士結社東湖上，貴游子弟傾動。府君（按：彭期生，1616-1646）惡其蠱眾，飛檄逐之出境。力持風教又如此。¹⁶

從「王孫紳士結社」、「貴游子弟傾動」，可知在此社中多半是宗室、士紳或富貴子弟，而南昌知府彭期生竟因「惡其蠱眾」，而將那批游伎研仙驅逐出境，亦可想見當時風氣之壞。

不過，我們也不能一概而論，部份宗室如朱鬱儀，並未沈迷於宴遊享樂，而仍得到士人的尊重。當陳弘緒批評宗室未肆力於學時，對朱鬱儀則推崇備至，另外，以經史學術著稱的朱統鑄（1561-1636）亦獲到陳弘緒的極高評價。但在明末制藝風潮下，朱鬱儀等人因不能寫作制藝，竟讓艾南英（1583-1646）發出「吾尤以為歎」的感歎。¹⁷艾南英，字千子，號天慵子，東鄉人，是明末江西的制藝四大家之一，他致力制藝文體的改革，主張必須能夠博覽群籍，甚至盡讀人間未見書，考古證今，方足以成學，然後發之為文（制藝）。朱鬱儀既已成學，卻未能為文，所以讓艾南英引以為憾。

也因此，天啟二年（1622）開放宗科，允許宗室參加科舉考試，不少宗室紛紛投入科考，如瑞昌王府朱統鈿（1591-1644）首登科目，而朱統鑄（1580-1648），與建安王府朱統鉅（1610-1692）亦陸續考取進士，至於考取舉人的宗室則更多。

也有宗室加入士人的社集，這類社集往往同時兼有詩社與制藝文社的性質。如曾是龍光社成員之一的朱謀聖便在熊人霖（1604-1666）主持的詩社中。¹⁸熊人霖，字伯甘，號南榮子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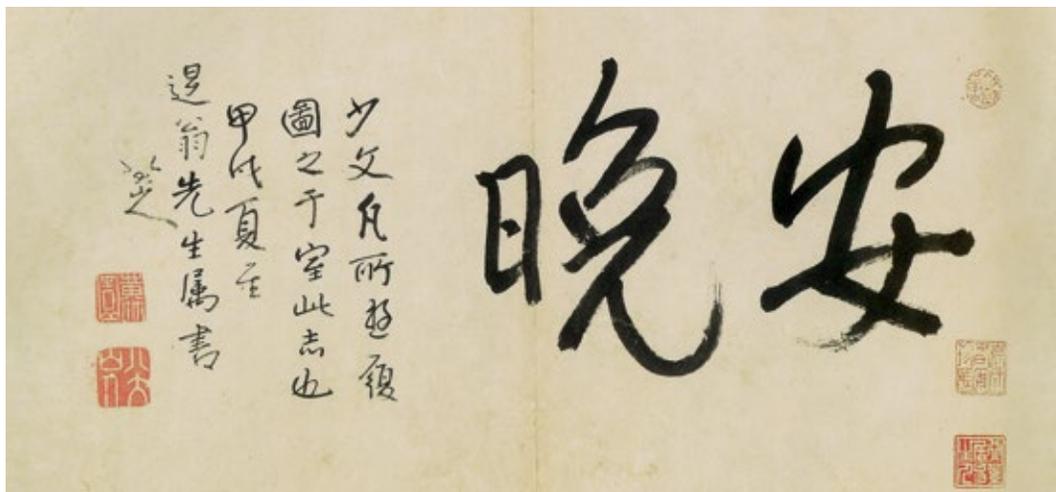


圖7 | 明 朱耷 安晚帖 泉屋博古館藏 取自泉屋博古館編，《泉屋博古——中國繪畫》，京都：泉屋博古館，1996，頁68-71。

崇禎十年（1637）進士，他是知名大臣熊明遇之子，父子二人與西學的關係頗為人所注意，而明末南昌的詩社多半由他主持。朱謀壘，字隱之，號八桂、厭原山人，屬於樂安王府，他與朱鬱儀並列江西宗室中藏書最多的兩人，而他的詩作被推為江西風雅之首。除了詩作以外，朱謀壘還仿元代陶宗儀（1329-1410）《書史會要》而作續編，及作《畫史會要》。（圖6）朱鬱儀之子朱統銓（1583-1648）入滕王閣社，¹⁹後來考取崇禎七年（1634）進士。滕王閣社是繼匡山社而起的社集，主要是制藝文社，也兼有詩社的性質，成員都是當時的知名士人。

這些參與士人社集，或是考取功名的宗室，他們的言行、任官表現，以及與士人群體的往來，幾乎跟一般士人無異。也可以說，明末，不少宗室都士人化了。

小結

過去學界較少注意宗室的文化活動，所以本文從社集活動的角度切入，談江西宗室與士人的關係，以及部份宗室的轉變，我們既看到宗室與士人共同主持詩社，也有宗室以博學或經史著稱，當士人轉向制藝寫作，宗室仍持續發展詩社，直到明末始衰。此亦有利於我們了解明清之際何以不時可見宗室的身影，如八大山人朱耷（1626-1705，圖7）、變換姓名而為寧都九子之一的林時益（1618-1678），以及知名大臣李元鼎（1595-1670）之妻朱中楣（1622-1672）也是宗室之女，並以詩作著稱。江西的宗室如此，其他地方的宗室又如何？很值得我們更多的研究。

作者為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

註釋

1. 吉川幸次郎著，鄭清茂譯，《元明詩概說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2012），頁179-181。
2. 錢謙益，《列朝詩集小傳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），丁集上，「齊王孫承綵」條，頁471。
3. 吳稼澍，《玄蓋草堂》（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集186，臺南：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7），卷16，〈八月十六日齊王孫國華招集迴光寺結小山社時以諸姬佐酒分韻二首〉，頁11-12；〈諸同社招國華王孫再集西園余以歸不及赴賦此為別〉，頁13。
4. 朱孟震，《朱秉器文集》（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年間刊本），卷4，〈與灌浦宗正〉，頁25。
5. 徐燦撰，沈文倬校注，陳心榕標點，《筆精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97），卷4，〈宗藩詩〉，頁108-109。
6. 如歐大任曾受邀弔陽王府竹在亭作客，便以「稱詩七子盡風流」稱七人，見歐大任，《歐虞部集》（收入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，集47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0，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刻本影印），《北轅集》，卷1，〈朱宗良、方士功、朱貞吉、朱巍甫、朱佳甫、趙脩甫、彭穉脩邀集竹在亭得秋字〉，頁3。另一首詩題〈答朱宗良、方士功、朱貞吉、彭穉脩、趙修甫五子〉，又以五子稱之。
7. 張鳳翼，《處實堂集》（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集137，據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），卷5，〈與胡孟弢書〉，頁14。
8. 梅鼎祚，《鹿裘石室集》（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集1378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，據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啟三年玄百堂刻本影印），卷5，〈豫章朱王孫多姪〉，頁14。
9. 朱孟震，《朱秉器文集》，卷1，〈勸遊編稿敘〉，頁49。
10. 陳弘緒，《陳士業先生集》（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》，冊54，濟南：齊魯出版社，2001，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康熙二十六年刻本影印），《恒山存彙》，卷2，〈朱萬合刻詩序〉，頁9。
11. 以上兩段引文俱見傅占衡，《湘帆堂集》（收入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，集165，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六十一年活字本刻本影印），卷2，〈晁次柳餘艸序〉，頁5-6。
12. 陳弘緒，《陳士業先生集》，《敦宿堂留書》，卷1，〈管理石城王府事鎮國中尉朱公傳〉，頁28。
13. 朱彝尊，《靜志居詩話》（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集1698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，據清嘉慶24年扶荔山房刻本影印），卷1，頁23。
14. 黃虞稷，《千頃堂書目》（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676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），卷31，頁27。
15. 陳弘緒，《陳士業先生集》，《敦宿堂留書》，卷1，〈管理石城王府事鎮國中尉朱公傳〉，頁28。
16. 彭孫貽，《茗齋集》（收入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，冊52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），卷23，〈太僕行略〉，頁16。
17. 艾南英，《天慵子集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80），卷2，〈朱咸一近藝序〉，頁27。
18. 熊人霖，《南樂詩文選》（東京都：高橋情報，1994，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崇禎十六年刊本影印），《文選》，卷17，〈朱洪遠詩引〉，頁7-8。
19. 《明詩紀事》有收錄其詩作〈滕王閣留別同社〉，見陳田輯撰，《明詩紀事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），甲籤卷2下，「朱統銓」條，頁78-79。